

唐朝时期党项族的迁徙与社会文化变迁

李吉和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唐朝时期党项族在吐蕃的进攻下不断向内地迁徙。由于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加速了党项族部落制的解体,促进了民族的整合和党项族社会文化的变迁。

关键词:党项族;迁徙;社会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2/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6)03-0091-05

Migration of Dangxiang People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ang Dynasty

Li Ji-he

Abstract: Dangxiang people migrated to the interior of China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Tibetans. The changes of their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speeded up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ir tribal syste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alities and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Key words: Dangxiang people; migrate;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一、党项族的迁徙过程

(一) 安史之乱前的迁徙

党项族原属我国古代羌族的一种。南北朝时党项族居住在“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①的广大地区,即今天的青海祁连山以南的河湟平原和甘肃西南部的洮河上游一带,西边在阿尔金山一带^②。

公元7世纪初,唐朝建立之初,为安定西部地区,对党项诸部采取“招抚”政策,以内附部落居住地设置府州,拜各部首领为刺史,实行羁縻政策,于是诸部纷纷内附。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贞观三年(629年),酋长细封步赖内附,其后诸姓酋长相率亦内附,皆列其地置州县,隶松州都督府。五年,又开其地,置州十六,县四十七;又以拓拔赤辞部置州三十二。”诸州大致地域在今川西、陇西南的青藏高原东部。到了贞观六年,前后内附的党项羌已有三十多万口了^③。贞观九年(635年),唐灭吐谷浑后,依附于吐谷浑的党项纷纷归附唐朝。不过,党项的内附只是起政治上服从唐朝的领导,还没有迁徙

原居住地,羁縻州也仅设在归附部落的原居住地。但是党项的归附,进一步加强了党项与唐王朝的政治依附关系,为其下一步的内迁创造了条件。

吐蕃的进攻,加速了党项族迁徙的进程。高宗乾封二年(667年)二月,吐蕃击破都、流、厥、调、湊、般、匏、迦、率、差等12个党项羁縻州,诸州废。咸亨二年(671年),又废蚕、黎2州。州的废置,说明唐已无法统治这些地区,而依附于唐朝的党项部落被迫向内地迁徙。“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拔诸部畏逼,请内徙,”^④于是唐朝将党项族迁往庆州地区,侨治静边等州安置,“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⑤这次迁徙的党项部落主要是拓拔部,《旧唐书·党项羌传》载:“拓拔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予以处之。”同时还有野利部、把利部、破丑部等^⑥。这些党项部落迁入庆州后,还有一部分自发迁徙,向北发展,迁往灵、胜二州,扩散到河套地区。为防止党项等民族的反抗,唐政府专门设置东、中、西三受降城,“其意,以中城、东乘连振武,为左翼;又以西城丰州连定远,为右臂,南制党项,北制匈奴。”^⑦

收稿日期:2006-01-11

作者简介:李吉和(1963—),男,河南南阳市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博士 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和西北少数民族民族史研究。

永隆元年(680年),吐蕃攻占茂州西南的安戎城(今四川马尔康县西南),尽据党项之地,在此前后有一些不甘吐蕃统治的党项人迁入内地。据《旧唐书·崔知温传》载,大概永隆年间,崔知温担任兰州刺史时,有“党项三万余众来寇州城”,被击败后,皆降附被安置。这批党项人很可能是“陇右北部诸州的内徙党项部众”^[8]。但最后被安置在何处,史书未载。

武周长寿元年(692年)二月,隶属于吐蕃的党项部落1万余人内附,唐在灵、夏置十州管辖。另外,在麟州、银州也有党项部落迁入。如开元九年(721年)康待宾乱时,“党项羌亦连兵攻银城(治今陕西神木县南)”,后为张说击败,“说招纳党项,使复故处……奏置麟州以安羌众。”^[9]《旧唐书》卷38《地理志》银州下载:“静边州都督府,旧治银川郡界内,管小州十八。归德州,寄治银州界,处降党项羌。”银川郡即银州,天宝元年后改名,由此可知银州有党项人迁入。

在陇右道也有党项部落。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在陇右道有党项州七十二,府一,县一,其中马邑州是开元十七年(729年)设置,位于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成州(治今西和县西)山谷间。

总之,在安史之乱前,关内道的北部、西部和陇右道的东部,包括胜、银、夏、麟、庆、灵、秦、成诸州,都有党项人移民。迁徙到这里的党项人一般以部落为单位,迁入新居后,唐朝政府设置羁縻府州加以管理。

(二) 安史之乱后的迁徙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经济凋敝,对西北统治削弱,吐蕃乘机扩张,迫使包括党项在内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内徙。

需要指出的是,党项的迁徙往往与其他民族一起,以军事手段为先导向关中逼近。肃宗至德末年(758年),分布在灵、夏二州的党项部落为吐蕃作向导寇边。乾元年间(758~760年),又进攻(治今陕西彬县)宁(治今甘肃宁县)二州,为郭子仪所率唐军击败^[10]。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有10个党项羁縻州内迁。《新唐书·党项传》载:“上元元年,在泾、陇部落十万众诣凤翔节度使崔光远降。二年,与浑、奴刺连和,寇宝鸡,杀吏民,掠财珍,焚大散关,入凤州,……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进寇奉天,大掠华原、同官去。诏臧希让代勉为刺史。于是,归顺、乾封、归义、顺化、和宁、和义、保善、宁定、罗云、朝凤凡十州部落诣肖让献款。”当然,这十万余人中并非全是党项,还有羌族和吐

谷浑人,《册府元龟》卷987载:“(上元元年)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泾州、陇州等界羌、浑、党项十万余众。”这些党项人有可能迁往灵州境内^[11]。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氏、羌20万众攻长安,焚掠而去。广德二年,铁勒部的仆固怀恩又率吐蕃、回纥等部进攻唐朝泾、汾等州,唐将郭子仪奉命讨伐。为阻止党项、吐谷浑与吐蕃联合,郭子仪上表奏请将散处盐、庆等地的党项部落分三支迁往他处分管。一是迁往银州(治榆林,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辖境当今陕西米脂、佳县地)以北、夏州(治朔方,今内蒙古伊盟乌审旗白城子,辖境当今内蒙杭锦旗、乌审旗及陕西大里河以北的红柳河流域)以东地区。《新唐书·党项传》云:“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大将军拓拔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其后,拓拔朝光率所部居银、夏之间,号平原部。后来的西夏国就是在平原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是迁往灵州安置。《新唐书·党项传》称:“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拔乞梅等皆入朝。”上述十州皆隶属灵州都督府。三是迁往延、绥二州。《新唐书·党项传》载:“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迁徙到这里的党项族后来形成了所谓的南山部。而拓拔乞梅率所部仍居庆州,号东山部。经过这次迁徙,出现了以地域命名的部名,反映了党项族社会发展进入了以地缘为纽带的阶段^[12],对党项族进一步巩固、发展有重要意义。

经过以上几次迁徙,到唐代宗广德年间,党项部落的聚居中心已由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区迁移到了今陕、甘、宁三边地区。但是党项的迁徙并未完成,以后还有一定的迁徙,但规模、迁徙的距离都不是太大,只是一部分党项人的迁徙。

唐代宗元年(765年)以后,党项又由陕、甘、宁三边地区东进北上,进入内蒙、山西交界处。

《新唐书·党项传》云:“六州部落……永泰后稍徙石州。”《新唐书·地理志》:“永定州,永泰元年以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附,析置州十五。”《旧唐书·代宗纪》说:“(永泰元年)戊子,河西党项永定等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宜芳等十五州。”《旧唐书·党项传》也载:“党项有六府部落……居庆州者号东山部落,居夏州者号平夏部

落。永泰、大历已后居石州,逐水草。”《资治通鉴》卷235也云;“六州党项自永泰以来居石州。”有的研究者认为,六州党项与河西党项是一回事,皆指分布在银夏地区的党项部落^⑬。永泰元年后,这些党项部落为寻找自然条件优越的牧场,于是渡过黄河,来到了水草丰美的石州地区(治所离石,山西今县,辖境在今山西三川河、湫水河流域)。至贞元十五年(799年),由于“用安城镇将阿思那思味扰其部落,求其驼马无厌,中使又赞成其事,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⑭,又回到了银、夏地区。党项的来回迁徙,使拓拔部落组织进一步解体。

会昌元年(840年)后,党项部落开始大规模从河套南部向河套北部迁徙。而在党项向北迁徙的过程中与南下的回鹘相遇,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气势正盛的党项所向披靡,向漠北挺进,“太和五年(831年)九月,……党项于黑山劫掠归国回鹘”^⑮,进入振武军北塞外的黑山。不久党项以军事为先导,向天德、振武迁移,进入河套北部地区。

凉州地区也有党项人。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高居诲奉使河西,经过腾格里沙漠,就看见这一带都是党项区域,直至凉州一带^⑯。这里的党项人很可能是唐后期迁来的。

总之,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党项四处迁徙,其分布范围、地域更加广阔,北到振武节度使所在地,东到河东的中部和北部,西到河西走廊的凉州,南到关中平原西北的、宁州,都有党项人的身影。

二、党项族的社会文化变迁

随着党项族的迁徙,居住地或游牧地自然、社会环境的改变,民族之间交往的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促进了民族融合,加速了党项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党项族到新的迁入地后,由于处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唐朝政府为统治之需,采取羁縻政策,客观上是有利于党项民族发展的。如党项族人口增长较快,甚至有的地方如夏州的党项族人口已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为此朝廷曾专设宣抚党项使,以安抚党项^⑰。元和年间沈亚之记载:“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⑱出现了“部落繁富”^⑲的景象,为党项族以后的崛起、建国奠定了人力基础。

(一)党项族的不断迁徙,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组织,有利于党项族的发展与壮大

党项族未迁徙之前,一般以姓为部,一姓又可分为许多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数千。迁徙后,由于不断的迁徙及战乱,部落离散,部落组织逐渐解体。如静边州的拓拔部既迁往银州,又置于灵州,芳

池州的野利部既徙于灵州,又迁于延、绥二州^⑳。同时党项迁徙后还和吐谷浑、室韦、汉族杂居,这样氏族的血缘关系遭到一定的破坏,形成了一些新的部落集团。如内徙前的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律)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八大部,内徙后逐渐演变为细封氏、费听氏、折氏、野利氏五大部,并出现了许多新的部族,如庆、灵之间的大虫族,庆州北面的野鸡族,丰州的藏才族等^㉑。在迁徙中或迁徙后,以地域关系为纽带的部落集团逐渐取代了血缘关系的部落集团,这主要表现为以地名为部落名或族名,说明部落或族中是由不同的部落或族组成的大部落集团或大族,为党项民族向更高级的发展,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迁徙后经济生产方式逐渐由以畜牧业为主向牧、农、商兼营发展

党项族迁徙之前,其原居住地地势高寒,土无五谷。如党项拓拔部所居的松州地区,“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㉒,不利于农业生产,因而以畜牧业为主,“不知稼穡,土无五谷”,仅“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其居住“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对于一些生活必需品,“求大麦于他界,酤以为酒。”^㉓

党项迁徙后,其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骆驼。”^㉔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较青海、甘南一带优越得多。首先,这里气温较高,植物的生长期较长,有利于牧草和农作物的生长,牲畜繁殖和生长也较快。其次,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史载:“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㉕,为党项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第三,西北不少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地方,水草丰美,牧场辽阔,有发展畜牧业的基础,促进了党项经济的发展。著名诗人元稹记载:“河朔之间,丰有水草,内附诸夷,多以畜牧为事。”^㉖在唐代,党项马驰名中原,唐明宗诏沿边置场市马,而党项马最多^㉗。

但是,随着迁入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加上唐朝政府又鼓励内附少数民族发展农业,因此党项也开始有了一部分农业生产。开元八年(720年),在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纷纷内附的形势下,玄宗敕关内、河东、河西入朝新降蕃酋曰:“无令田陇废业,含养失所,递相勉谕,以悉朕意。”^㉘九年,党项在唐朝镇压了兰池州突厥康待宾的反抗,将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人迁往中原后,把党项族徙居河曲,继承了突厥人留下的农田渠道。据记载,夏州在“贞元七年(791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亩二百顷。”^㉙大中五年(851年),唐政府又给南山党项“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㉚党项的迁徙地灵州、

河套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适合发展农牧业和水利灌溉业。因此在唐朝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下,有一部分党项人被迫从畜牧业改为农业生产是自然而然的事,当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不多,其主要经济仍然是畜牧业,但终究其生产方式有了一定改变,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党项的迁徙,也促进了其商业贸易的发展。党项族迁徙到河西、陇右和鄂尔多斯南边地区,这里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连结处,是西北少数民族同中原贸易的要道。唐朝政府一直采取限制中原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贸易的政策,曾禁令“诸锦、绫、罗、谷、绣、织成、绸、绢、丝、牦牛尾、珍珠、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⑧;贞元三年(787年)又规定“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⑨但是这种政策正好说明了党项人和中原人之间存在的经济贸易关系。后来在党项人民和中原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唐朝的政策有所调整。大中四年(850年),宣宗被迫下诏:“除禁断兵器外,任以他物于部落往来博易”,于是“远近商贾赍缯货入贸羊马”^⑩,党项人也“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⑪,武器的贸易增强了党项族的军事力量。同时也以畜牧产品换取粮食、食盐、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中原王朝和人民也从受益非浅,“求珠驾沧海,採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⑫

(三)文化习俗发生了变迁

文化习俗是一个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也不同。随着民族的迁徙,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民族的文化习俗必然发生变迁。

党项族自南向北迁徙,在迁出地就与吐蕃、羌、吐谷浑、氏、汉等民族错居杂处,在迁徙中又与北方一些民族交往,又处在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交汇带上,因此随着党项族的迁徙,其文化习俗在不断循序渐进地发生着变化,使其文化习俗带有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饮食结构和习俗的变迁。饮食习俗与自然的关系很大。在迁徙前,党项族居住在高寒地区,经济以游牧为主,因此其食物来源大部分是肉食。在隋代,党项人“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⑬,即使到了唐代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仍然是“畜牦牛、马、驴、羊,以食,不耕稼。”^⑭到了迁入地后,由于这里是农耕区,随着与农耕民族交往的扩大,党项族以马、牛、羊等畜产品换取大量的粮食,粮食开始成为党项人的重要食物来源,促使其

饮食结构有了一定的变化。曾巩记载:党项“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苳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苳蓉、小茺萸,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嵩、碱松子,以为岁计。”^⑮由此可见,粮食还是紧俏实物,仅供军队食用,一般平民则以西北沙漠特有的野菜为生,而很少食用肉食。西夏国建立后,由于占领了河西等广大农业区,大力发展水利灌溉事业,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党项人的实物种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成书于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人相中》部分记载了党项的食品为:“细面、粥、乳头、油饼、胡饼、蒸饼、干饼、烧饼、花饼、油毡、盏饅、饺子、馒头……”^⑯粮食有“粳米(后加糯米二字)……黍米、大麦、小麦、小米、青稞、赤谷、赤豆、豌豆、绿豆……稻谷……”^⑰等。从中可以看出,党项人的面类食品丰富,几乎与汉族食品毫无差异。而粮食中既有南方的白米、炒米、稻米,也有北方的麦类、豆类。因此党项人的食品中是南北兼顾,既有北方民族的奶制品和饼类,也有游牧民族的食品风格。

(2) 居所的变迁。游牧民族的住所也是为了适应游牧民族常常迁徙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住所都是易建易拆、搬运方便的建筑。随着迁入地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方式的变化,住所具有了一定定居化的特征。党项人早期居住是“织牦牛尾及羖毛以为屋。”^⑱《旧唐书·党项传》也载:“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是典型的游牧居住习俗。迁徙后,一部分党项人仍然过着游牧社会,居住毡帐,另外一部分从事定居农业生产的党项人,“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⑲尤其建国后,党项人的房屋建筑结构、样式更是吸取了中原地区的建筑特点。

(3) 服饰的变迁。在从青藏高原迁徙到西北以前,与当地自然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其服饰以耐寒的畜产品为主要原料。《隋书·党项传》载:“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旧唐书·党项传》也云:“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袒毡。”迁入西北后,由于这里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因而其服饰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很大。从服饰的原料上来看,由原来的裘、褐等皮毛制品逐渐转向布帛、锦缎等棉丝制品,这在上层贵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党项首领李德明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回答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⑳这些棉丝制品一部分是赏赐,但大部分是通过贸易形式获得的。说明到西夏初期,党项人尤其是上层贵族向中原贵族服饰习俗靠拢,受汉族的影响很大,以至引起元昊的反

感。

(4)发式的变迁。关于党项人的早期发式,由于史书记载较少,我们所知不多。如果党项是羌人的后裔的话,那么其发式应是“被发覆面”,后来元昊曾颁布“秃发令”,足见其“被发”的习俗较重。关于女子发式,元人马祖常《河西歌》中写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在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墓葬版画中的侍女图也梳作高髻发式^⑨。高髻为唐代妇女的普遍发式,另外回鹘妇女、吐蕃人的顶髻状也是这种发式,可见党项人的发式在迁徙后受北方其他民族的影响。

(5)葬俗的变迁。党项人的葬俗主要是火葬,“死则焚尸,名为火葬,”^⑩这种习俗在西夏建国后一直保留着。但是在党项族迁徙到北方后,随着党项族经济由游牧向农耕的过渡,受汉族丧葬文化的影响,在一些上层贵族中由火葬改为土葬。如李继迁在陕北时,曾“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北流,凿石为穴。”^⑪尤其西夏建立后,仿效唐、宋,建立封建陵墓制度,是其葬俗变迁的重要体现。当然,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在下层百姓中,火葬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6)宗教信仰的变迁。党项人早期的宗教是多神信仰的自然崇拜。党项族迁徙到西北后,其迁入地正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并且佛教一直在这里流行。居住在其南边的汉族,北边和东边的契丹族,居住在西部的吐蕃和回鹘都信仰佛教。党项在与这些民族的交往中,受到这些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逐渐改信佛教。尤其是建国后,佛教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①魏征. 隋书·党项传(卷8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②⑪⑬汤开建.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4. (1).

③刘昫等. 旧唐书·太宗纪下(卷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④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320)胡三省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⑤⑥⑩⑫欧阳修. 新唐书·党项传(卷22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⑦李吉甫. 元和郡县制·关内道四·丰州·天德军条(卷4)[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⑧周伟洲. 唐代党项[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8. 39.

⑨欧阳修. 新唐书·张说传(卷125)[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局, 1975.

⑫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307.

⑬⑭⑮刘昫等. 旧唐书·党项羌传(卷19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⑯册府元龟(卷995)[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⑰徐松. 全唐文·于阗记(卷850)[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⑱⑲⑳李昉等. 文苑英华·夏平(卷370)[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㉑欧阳修. 新五代史·党项传(卷74)[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㉒⑳刘昫等. 旧唐书·党项羌传(卷19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㉓徐松. 全唐文·授王元琬银州刺史制(卷649)[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㉔薛居正. 旧五代史·党项传(卷138)[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㉕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卷128)[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㉖⑳刘昫等. 旧唐书·德宗纪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㉗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249)[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㉘王浦. 唐会要(卷86)[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㉙长孙无忌. 唐律疏义·禁卫下[M]. 中华书局, 1983.

㉚㉛欧阳修. 新唐书·党项传(卷22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㉜元氏长庆集·估客乐(卷23)[M].

㉝⑪⑪魏征. 隋书·党项传(卷83)[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㉞⑫曾巩. 隆平集·夷狄传·夏国(卷20)[M].

㉟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 番汉合时掌中珠[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

㊱史金波. 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A], 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C],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㊲脱脱. 宋史·外国·夏国上(卷485)[M]. 中华书局, 1977.

㊳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插图10.

㊴吴广成. 西夏书事(卷7)[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张 科]

[责任校对 陈亚艳]